

(上接第9版)

据《宋史纪事本末》记载：“(靖康元年三月)癸丑,先是,粘没喝围太原,悉破诸县,独城中以张孝纯固守不下……乃分兵南下。折可求(都统制)、刘光世(鄜延路副总管)军皆为所败。平阳府叛卒导金兵入南北关……既越关,知威胜军李植以城降。乙卯,攻隆德府,知府事张确、通判赵伯臻皆力战死之。未几,粘没喝还云中,留兵围太原。”这里的南北关据《宋史·地理志二》所记,是指灵石的阳凉南关、阳凉北关。威胜军是宋初设置,管理今天的沁县一带。隆德府包括今长治、屯留、襄垣、潞城、壶关、长子、涉县、黎城一带。又据《金史·太宗本纪》记载:“(靖康元年)八月庚子,诏左副元帅宗翰、右副元帅宗望伐宋。宋张灏率兵出汾州(灵石时属汾州),拔离速击走之。刘臻以兵出寿阳,娄室破之……九月丙寅,宗翰克太原,执经略使张孝纯。鹞沙虎取平遥、灵石、孝义、介休诸县。”由此可见,山西大部在靖康元年即遭金兵铁蹄蹂躏。

眼见山河破碎,面对强悍的金兵,河北、河东(今山西)百姓不甘心屈服,到处起而团聚自保,武装抵抗,忠义民兵“动以万计”。河东路(今山西)义军风起云涌,抗金斗争如火如荼,晋东南更成了抗金的根据地。晋城、长治一带的“红巾军”用一条红巾作为标志。太行山一带由王彦领导的“八字军”,在面部刺“赤心报国,誓杀金贼”八字,以表誓死抗金之决心。这两支队伍都是抗金的劲旅。河北、河东(今山西)各部义军之间,多有共同的联系和组织。“红巾军”和“八字军”的共同组织就是遍于太行、黄河两岸的“巡社”。“巡社”的义军,一般不脱离生产,而是“寓兵于农”。义军作战英勇,连营结寨,人数多则数万,少则几千、几百。朝廷官吏逃走后,他们坚守抗敌,甚至从金军手中收复了失地。

山西、河北等地民众轰轰烈烈的抗金斗争,深刻地影响了朝廷以李纲、宗泽为代表的主战派。李纲多次上书皇帝,请联络义军,以解京师之围。朝廷迫于形势,也想利用义军解围,接受了主战派的建议,曾数次下诏号召义军“勤王”。《三朝北盟会编》记载,南宋高宗赵构即位不久下诏书

时间的琥珀里,凝固着人类最闪光的智慧

——多彩宋金元(上)

说:“忠义之士,如能竭力捍御保(有)方,及纠集师徒,力战破贼者,至建炎二年,当议酬其勋庸,授以节钺。”于是,在河北设置招抚使,河东(今山西)设置经制使,与义军密切联系。

这一时期,南宋曾经出现了同仇敌忾、壮怀激烈雪耻靖康的大好形势。可惜没过多久,朝廷投降派得势,诬蔑义军为“盗寇”,甚至勾结金兵加以剿灭。如火如荼的抗金形势就这样消失了。

灵石发现的抗金文献,讲述的就是这段历史故事。

时间追溯到1966年初。灵石县的两位农民在绵山采药,不经意间在山体石缝中发现了一个铜罐。铜罐中装有南宋建炎二年文献五件,保存完整,字迹清晰可辨。

第一件是札,是鄜延路经略安抚使王庶发给李实的委任状。白麻纸,长58厘米、宽42厘米。开头的官称是印刷的,正文用毛笔墨书。

札文一方面表彰河东路都统制李武功不负朝廷所望,为收复河东故地召集到忠义民兵甚众;另一方面委任李实为进武校尉。札末有花押和九叠篆书官印。

第二件是手书,虽未署名写给谁,但从其内容来看,应该是忠翊郎、统领武仪写给李实的书信。白麻纸,尺幅不大,长30厘米、宽24厘米,毛笔墨书。

第三件也是手书,虽笔者未署名,但花押与第四件札相同。第四件札为李武功发给李实的委任状,所以第三件手书应该是李武功发给李实的文件。手书,白麻纸,长57厘米、宽37厘米,毛笔墨书。手书开头称李实为保义郎。接着任命李实统领官职位。告诉李实,李武功自己已经在“西山下寨聚集到诸统制、统领、将佐、兵卒等3400余人,今更行勾追人马,如大军数足,火急前去也”。在出发前,李武功要求李实与将官李岳一起,把他的老小家眷转移到安全的地方,防止被人加害。等到来日武功返回,“尽事韦家首下国贼之人,尽皆斩尽杀绝,方事报仇”。并委托来人给李实捎去河南宣抚司官札一道,希望李实收到后妥善保管。从中可以看出,李实与武仪、李武功的关系都比较密切。委任李实为成忠郎,是武仪向李武功保荐的。李实是武仪与李武功之间的秘密联络人。

第四件札是李武功答应委任李实为成忠郎的委任状。札长53厘米、宽33厘米,白麻纸,开头和札末的官称是印刷的九叠篆文,正文用毛笔墨书。

札抬头书“都统河东路军马安抚使司”。“先准经制殿撰使司,备奉圣旨,指挥召集义兵,收复河东路州县”。根据忠翊郎、统领武仪的保荐,保义郎李实,“破荡高壁店北贼大

寨”“见阵杀获头一级,当司契勘,本人委有心力,合宜补转成忠郎”。落款是“武口都统河东路军马差遣安抚使李”。札末有花押、官印各一。官印为水印,九叠篆文,印文“灵石县尉朱记”。今灵石有高壁岭、荡荡岭,地形险要。想必当时金兵在此设寨,被李实等所破。

第五件札是河东陕西路经制使司发给李实的正式委任状。札长60厘米、宽44厘米,白麻纸,为刻版印刷,中间有一部分关于具体人名和事迹的用墨书填写。委任状有编号,为甲子论字号。委任状写道:“契勘金贼侵犯中原,恣为焚掠,河东土庶,首被其害,披发左衽,勉强从俗。怀忿蓄怨,累年未发。今据右武大夫都统制河东军马李宋臣,仗义自奋,纠率民兵,掩杀贼众,收复陷没州县。内成忠郎李实,累与金贼斗敌有劳,检准尚书省札子,备奉圣旨,依申请列,划一指挥,许不拘常制,便宜行事。今将李实借补成忠郎,须至札付者。右札付李实。准此。建炎二年九月初四日。”札末花押、官印各一。官印为水印,九叠篆文,印文“重使朱记”。

手书与札中的鄜延路,是宋时行政区划名称。经略安抚使,掌管一路兵民之事。都统制,建炎前不为官职,只是出师征讨前,诸将不相统一,拔一人为都统制,指挥全军。建炎初始为官职。进武校尉、保义郎、右武大夫、成忠郎、忠翊郎均是当时的武官名,级别不同。

根据这五个文件,我们可以得知:李实当初地位并不高,因为组织义军抗金,鄜延路委任他为进武校尉,后来一再提拔,但也不过是正九品的保义郎、成忠郎。武仪当初地位也不高,官阶忠翊郎,也是不大的头衔。李武功,又名宋臣。第四件札上“灵石县尉朱记”的官印说明李武功原任灵石县尉,后升任河东路军马都统制,官阶为右武大夫。“都统河东路军马安抚使司”即设在灵石县,故借用了此官印。

为了作战方便,李实将五个文件装入铜罐,藏在绵山半山腰的石缝中,再未取出,直到800多年后才被发现。

灵石这批抗金文件的发现,让人们看到了800余年前抗金义军抛头颅洒热血、浴血奋战的实物见证……